



香港都會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
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TIN KA PING CENTRE OF CHINESE CULTURE

何謂「中國數字人文」？

數字人文與中國文學

數字人文與中國歷史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通訊

Newsletter of Tin Ka Ping
Centre of Chinese Culture

主編：梁慕靈
客席編輯：王賀
設計及出版顧問：劉文英、黃樹基
項目統籌：楊詠詩
助理編輯：龔倩怡

田家炳基金會支持
issue Sep / 2022



主編：梁慕靈
客席編輯：王賀
設計及出版顧問：劉文英、黃樹基
項目統籌：楊詠詩
助理編輯：龔倩怡
設計及排版：On Your Mark 設計實驗室



第十期

目錄

01 編者的話

「數字人文在中國」專題

02 何謂「中國數字人文」？
王賀博士

04 數字人文與中國文學
徐永明教授

07 數字人文與中國歷史
陳松博士

10 數字人文與中國哲學
胡士穎博士

12 數字人文與話劇研究
任貴菊博士

14 數字人文視野下的現代文學史料研究
——以張愛玲研究為例
梁慕靈博士

17 數字人文視野下的電子遊戲理論研究
劉翔先生

20 科技藝術：數字人文研究新領域
劉婷女士

23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2022年活動概要

31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新書簡介及媒體報導

32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通訊》投稿須知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Newsletter of Tin Ka Ping
Centre of Chinese Culture

通訊

2022年下旬，疫情陰霾仍未退卻，人們在超過三年的疫情期間，已經發展出一種新的生活形態。當中，數字化技術發揮了極大的積極影響。在學術研究方面，數字化技術帶來的不僅是研究材料在搜集、組織和儲存上的變化，更多的是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和思考方法。本期《通訊》獲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賀博士擔任客席編輯，組成了「數字人文在中國」的專題，為我們了解數字化技術應用於中國文化和文學研究方面帶來最新的分析。除了王賀教授，還有徐永明教授、陳松博士、胡士穎博士、任貴菊博士、劉翔先生和劉婷女士為本專題撰寫文章，讓我們了解到數字人文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在此本人代表中心感謝諸位的支持。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將於本年度下旬出版兩本關於創意寫作的專書，一本名為《華文創意寫作與跨媒體實踐》，另一本專書名為 *Chinese Creative Writing Studies*。當中所收輯的論文主要探討創意寫作課程的設計及實踐方法，以及跨媒體結合的可能性。中心希望藉著出版兩本專書，能進一步推廣華文創意寫作，讓讀者更了解創意寫作發展的可能性。另外，中心與上海大學和溫州大學創意寫作團隊合作的《中國創意寫作研究》亦將陸續出版，希望各位關心創意寫作發展的讀者繼續支持我們。除了出版計劃，中心本年持續積極與校外團體合作舉辦各類型的活動，詳情可見本期的活動介紹。

在後疫情時代，我們每天都會迎接各種挑戰和機遇，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將不斷以各種新的方式去推廣中華文化。

梁慕靈博士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創意藝術學系系主任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主任

何謂「中國數字人文」？

自本世紀之初起，「數字人文」（亦稱「數位人文」或「數碼人文」）在兩岸三地的學術界漸次蔚為風潮。隨著其不斷發展、變化，關於「數字人文在中國」的學術史之回顧，已有不同學者從文獻計量、主題詞分析、歷史主義考察、中西比較等多種視角、方法出發，作出了不少研究。這些研究對於我們理解數字人文與中西人文學術關係、檢視「中國數字人文」的成就與限度、開發今後數字人文的研究議題及實操路線等，均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價值。

不過，這些為數甚夥的綜述，似乎還都缺乏一個必要的維度，即從人文學術的本位出發，從人文學術的各個專業領域出發，認真考慮下述問題：如何定義數字人文？數字人文是否與本領域的定位、研究旨趣及整體預設有所衝突？如何調解？其是否有必要引進本領域？如果有必要，又該如何與本領域結合？在本領域現已有哪些值得重視（未必十分成熟）的研究及其他成果？目前面臨的困境為何？如何破解其「痛點」與「難點」？……基於此種考慮，「數字人文在中國」專輯邀請諸位人文學者，從其所在的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哲學、中國話劇、現代文學與文獻史料研究等不同領域出發，就該領域的數字人文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操、研究方法與基礎設施（DH Infrastructure）、¹學者個體與學術群等問題略予檢討，以利閱者鳥瞰其大勢，掌握其關鍵所在。另外，本專輯也酌情納入了關於電子遊戲、科技藝術等數字人文新興領域的兩篇研究回顧，以供讀者參詳。

¹ 在中國人文學術領域，也被稱作「數字漢學基礎設施」（Digital Sinology Infrastructure）或「中國研究的網絡基礎設施」（Cyber Infrastructure for China Studies）。這些概念的提出，可能受到Rae Zimmerman和Thomas Horan提出的「數字基礎設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s）的影響，參見Rae Zimmerman and Thomas Horan e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enabling civil and environment systems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這些討論無疑都是極為概括的，各篇論文討論的重心也不盡一致，亦不求面面俱到，各文所理解的「數字人文」及其「在中國」的歷史，彼此之間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正如同今日兩岸三地乃至全球範圍內眾聲喧嘩的數字人文研究、實踐生態本身。不過，在筆者看來，與動輒長達數萬字的專題研究論文相比，簡短的觀點性文章 (Commentaries) 同樣有其貢獻；另一方面，就數字人文的現況而言，我們似乎也不必急於求同，求得共識，而恰應該在尊重彼此的認知差異 (如數據科學、圖書館學所謂的「本體」，和我們人文學者通常理解的「本體」似非為一物)，進行充分的討論、商榷，尤其是在來自人文學術諸領域和數據科學、社會科學、圖書館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之間展開密切而深入的討論、對話這一基礎之上，才有可能達成某些共識，建構出新的、真正的、適合數字人文的學術規範與學術共同體。在此之前，不妨各行其是，「各為其主」，以維持人文學術的活力、個性及其與時代的複雜辯證關係。

當然，這一專輯本身也是促進人文學術諸領域之間的交流、人文學術與數字人文其他相關領域的互動的一種努力。與前此可能過分強調人文學者向數據科學學習的觀點相反，筆者希望能夠以此刺激、啟發數據科學等領域研究者，注意體會、吸收人文學術遺產及其學術訓練、研究方法。²「數字」和「人文」之間應該是雙向的、交互的，這不僅是由於任何單向的關係都很難維持持久、穩定，³也是數字人文與傳統人文、數據科學等既有領域的不同所在。

同此，筆者也希望藉此能夠促進學者對「中國數字人文」研究、實踐的反思與想像，在中國學術語境中發展出真正面向人文學術的「數字人文」，亦即「中國數字人文」。因為事實上，作為一種新的研究取向，「數字人文」在中國人文學術領域，目前並未產生真正具有典範性、挑戰性和持久性影響的成果，而只有一些基礎設施和零星的研究論文。無論是異邦學者，還是以中文作為母語或主要使用中文作為學術語言的所謂的「本土」學者，至今竟連一部專書都無法貢獻出，尤其對後者而言，今後「究竟是成為西方『數字人文』理論、方法的注腳，還是『別求新聲』、深造自得，使之成為中國人文學術研究的新的起點，抑或是開創出『中國數字人文』這一新的研究典範，端賴新一代學者的自覺和不懈努力。」⁴



王賀編：《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自覺——陳子善教授榮休紀念集》（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2020年）。



王賀著、王靜編：《數字時代的目錄之學》（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2021年）。

² Jo Guldi, "What Can the Humanities Teach Us About Big Data?", <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171186>.

中文譯本可參考喬·古爾迪 (Jo Guldi)：〈人文能教會大數據甚麼〉，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4ilgzGizmsO5Q_41BatMQQ，瀏覽日期：3/2/2022。

³ 此係 "What Can the Humanities Teach Us About Big Data?" 一文中文譯者按語。Jo Guldi, "What Can the Humanities Teach Us About Big Data?", <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171186>. 中文譯本可參考喬·古爾迪 (Jo Guldi)：〈人文能教會大數據甚麼〉，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4ilgzGizmsO5Q_41BatMQQ，瀏覽日期：3/2/2022。

⁴ 王賀：〈「數字人文」與傳統學術〉，《文藝爭鳴》第10期（2020年），頁68。

數字人文與中國文學

這四十年來，數字人文對中國文學研究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果中國文學的研究有一個分水嶺的話，那麼，數字化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和紙質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無疑就形成了天然的分水嶺。在紙質時代，學者的研究，主要靠長期的積累和大量的文獻閱讀纔最終有所成就。他們往往採用做卡片的方式積累資料。民國時期的學者洪業，主持編纂了「十二經引得」和《杜詩引得》這樣通檢性質的工具書，為的就是給學者們的研究提供方便。而數字化時代，學者瞬間可以獲得海量的文獻，可以對幾億字的文獻進行地毯式的秒查，因此，在數字化時代，學者獲取文獻和數據的能力，大大超過了前輩的學者和古人，從而也易於生產出論文和著作。數字化文獻可通檢、易存儲的特點，使得每一個知識份子都難以抗拒它的誘惑而「獨善其身」。套用魯迅論《紅樓夢》的「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的話來形容數字化時代的文學研究，¹那就是「自有數字化文獻產生以後，傳統學問的路數和寫法都打破了」。像錢鍾書這樣頂尖的學者，當西方一出現電腦，就敏銳地意識到電腦技術在人文領域中的作用，倡導把電腦技術引入中國古典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疏證中，支持和資助助手樂貴明團隊進行「《全唐詩》速檢系統」等數據庫的建設。對於數字人文與文學研究關係的理論探討，《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及《中國社會科學》等重要刊物都發表了相關的文章，涉及文獻的檢索和挖掘、定量和定性分析、數據庫建設、地理信息、文學地圖、視覺化等問題。隨著數據庫知識和編程語言的普及，一些青年學者和學生已開始用相關的工具和編程語言來進行文本挖掘和可視化分析。這些現象，都是近幾年中國文學研究中出現的新動向。

¹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第9卷，頁348。

關於結構化和智慧化數據及平台建設，近幾年也越來越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哈佛大學以著名漢學家包弼德 (Peter K. Bol) 為首的數字人文團隊，早在2005年開始就與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系共同建設「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簡稱CBDB)，與復旦大學史地所建設「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另外，他們還建有「世界學術地圖」(World Map) 數據庫。這些數據都是結構化的人物數據或地理信息數據。而結構化的數據與工具相結合，就具有計量統計、定位查詢、空間分析和視覺化呈現等特點，顯示出傳統方法和手段難以抗衡的功能性優勢。應該說，在文獻的數字化方面，中國的進展並不比西方落後，像前面提到的中國社科院的欒貴明團隊建設的「《全唐詩》速檢系統」，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建設。其他古籍數字化產品如「國學寶典」、「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及「中國基本古籍庫」等，都於本世紀初先後問世。然而，在結構化數據庫和平台建設方面，中國的理念和建設時間，相對於西方來說，都要落後一些。

中國最早的結構化數據軟件，當推北京大學李鐸教授團隊開發的《全唐詩》和《全宋詩》分析系統。這兩個分析系統，除了全文檢索的功能外，還用詩韻數據庫對《全唐詩》和《全宋詩》所收詩的平仄進行了標引。李鐸團隊後來又開發了「《資治通鑒》分析系統」，實際上類似於現在的實體識別，具有了智慧化數據的特徵。受哈佛大學的影響，中國於2017年開始相繼出現了幾個頗有影響的結構化數據平台。一是中南民族大學王兆鵬教授主持的「唐宋文學編年地圖」(2017, <https://sou-yun.cn/MPoetLifeMap.aspx>)，二是首都師範大學張萍教授主持的「絲綢之路歷史地理信息系統」(2017, <https://www.srhgis.com>)，三是浙江大學徐永明教授主持的「學術地圖發佈平台」(2018, <http://amap.zju.edu.cn>)。前兩者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資助項目，王兆鵬的項目偏重於古代文學，張萍的項目偏重於歷史。徐永明的「學術地圖發佈平台」是與哈佛大學地理分析中心共建的、一個綜合性的地理信息數據發佈平台。

「唐宋文學編年地圖」共發佈了唐宋時期共100餘位詩人的行跡圖和他們的詩作定位。平台從作家、時間、地點三個維度直觀呈現了唐宋作家的生平行跡和創作情況。「學術地圖發佈平台」發佈了500餘位名人的行跡圖及大量的群體人物分佈圖，如《世說新語》、《全唐詩》、《全宋詩》、《全宋文》、《全宋詞》、《全元文》、《全元詩》、《歷代婦女著作考》及《晚晴簃詩匯》等作者的分佈圖，《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等書目定位查詢圖等。「學術地圖發佈平台」三年來共發佈數據地圖1800餘幅，共有60多個國家數十萬的讀者訪問了該平台。

結構化的文史數據與數字地圖相結合，大大增強了人們的空間認知，激發了人們的時空想像，使高冷的象牙塔學術也快速地「飛入尋常百姓家」，將人們帶入了一個讀圖的時代。然而，不得不承認，結構化數據也存在著數據碎片化的遺憾，它不能將完整的文本有機地結合起來。因此，結構化數據必須要與文本數據關聯，向智慧化的數據化方向發展。所謂智慧化數據平台，就是借鑒知識圖譜理念，綜合運用大數據的計量統計、定位查詢、聚類查詢、空間分析、數據關聯、網路分析、機器標引、眾籌眾包等技術，將文獻和研究成果圖譜化、智慧化，從而打造集瀏覽、查詢、研究、欣賞於一體，熔審美閱讀、知識學習、場景體驗於一爐的古籍智慧大數據平台。在這一方面進行實驗的，如荷蘭萊頓大學開發的MARKUS(文本標引平台)系統，德國馬普所開發的LoGarRT(中國古代地方誌)系統、臺灣大學開發的DocuSky數字人文學術研究平台。中國內地的有北京大學王軍教授主持開發的《宋元學案》知識圖譜視覺化系統及徐永明主持開發的「明代文學智慧大數據平台」(現改名為「智慧古籍平台」, <https://csab.zju.edu.cn>)等。「智慧古籍平台」目前利用眾包系統整理了20餘部明代別集，除了全文檢索、圖文對照功能外，還有人物的世系圖、社會網路關係圖等，其中的古籍文本，由於關聯了後台的工具書庫和地圖，地名可以在地圖上定位，詞語有解釋、傳統紀年可自動換算成西元紀年，極大方便了讀者的古籍閱讀。平台自2021年10月上線以來，已有20多個國家10多萬的閱讀量。

人類文明的演進是與工具的使用分不開的。文獻的數字化，使得文獻的載體由過去的紙張得以向硅質材料的芯片上轉移。而數字化的文獻，使得各種工具和編程語言得以大顯神通。因此，今後的中國文學研究，將會進一步受到數字人文理念和方法的影響。清代桐城派作家姚鼐在《述庵文鈔序》上說：「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²姚鼐這裡雖然說的是學問上的事，實際上也是對古代知識份子所應具備的三種才能。在今天的數字化時代，在姚鼐的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模式上，還必須加上計算機能力，我們可以稱之為算法 (algorithm) 或算力，即新文科的人才，應該是義理、考據、辭章與算法四位一體的人才培養目標。我們要清醒認識到，文獻的數字化之後，必然會向文獻的結構化和智慧化數據方向邁進，而這一切才剛剛開始。



學術地圖發布平台首頁
(圖片來源：<http://amap.zju.edu.cn>)



智慧古籍平台
(圖片來源：<https://csab.zju.edu.cn>)



蘇軾行跡圖
(圖片來源：<http://amap.zju.edu.cn>)

² 姚鼐：《惜抱軒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三年刻增修本），卷四，第1453冊，頁30-31。

數字人文與中國歷史

數字技術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經歷了一個從數字化 (digitization) 到數據化 (datafication) 的發展過程。¹數字化是信息存儲和分享格式的改變，即使用數字技術將以紙張、膠片等形式保存下來的歷史資料轉變為二進制格式存儲於數碼介質中。早期的數字人文項目都從數位典藏起步，使用掃描、數碼攝影等技術對歷史文獻和影音資料進行數字化，或使用人工錄入、光學字符識別 (OCR) 等手段建立可檢索的全文資料庫。然而，數字技術不僅為史料的保存和分享提供了新的媒介，也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分析工具。²近年來，各領域的學者開始探索如何在歷史研究中利用數字技術的分析功能。這些探索大大拓寬了數字技術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面。

使用數字技術進行歷史研究，就是藉助電子計算機強大的信息處理能力對歷史數據進行定量分析，它本質上是歷史學計量化的一個新階段。³歷史學計量化離不開史料數據化。數據化和數字化是互相關聯卻不盡相同的兩個概念。和數字化不同，數據化關注的不是資料的存儲形式，而是描述事物的手段，即以數據的形式對事物進行描述和記錄。這種描述形式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但是無論何種形式的數據都是以便於匯總和分析為目的的。換言之，數據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隨著分析方法的進步，越來越多的信息成為可以直接用於匯總和分析的數據。儘管數據的出現（如一個國家的戶口和田產數據）遠在數字技術之前，數字技術的發展不僅大大提升了數據收集和利用的效率，而且數字分析方法的進步也拓展了數據的定義，讓很多以往不曾被視為「數據」的歷史資料逐漸成為數據分析的對象。譬如，對於藝術史家和研究視覺文化的學者而言，以數位格式保存的繪畫、漫畫、政治宣傳畫等就是可以直接用於量化分析的影像數據，使用圖形處理軟件就可以計算每幅圖像的飽和度、對比度等指標，繼而研究這些指標的分布特徵。

¹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and Kenneth Cukier,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78.

² 有關數字技術的這兩種不同用途，可以參考 John Theibault 的觀點。在討論可視化與史學論述之間的關係時，他從分析功能和呈現功能兩個角度對可視化的意義做了區分。John Theibault, "Visualizations and Historical Arguments," in *Writing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ed. Jack Dougherty and Kristen Nawrotzki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3), 174.

³ 王旭東：〈20世紀歷史學傳統嬗變和方法論的計量化〉，《甘肅社會科學》第5期（2013年），頁68-70。

而對於究心文字史料的學者而言，用文本格式保存的歷史文獻近年來也成為可以直接用於量化分析的數據。使用文本複用、詞頻分析、主題模型、文檔聚類等分析技術，可以揭示不同文本在內容和風格上的異同。⁴換言之，隨著上述分析技術的出現，數字化的歷史影像和文獻都成了「數據」。不過，這些數據是非結構化的，它們沒有預定義的數據模型，沒有按照預先設定的規則加以編排。直接使用非結構化數據開展的研究工作目前主要出現在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領域，在史學研究中相對較少。因為這種研究方法以文本（或影像）為直接的分析對象，分析結果通常停留在文本和話語層面，它所能揭櫫的歷史問題通常是文本的語言構造中折射出來的歷史現象，如思想觀念的變遷、歷史書寫背後潛藏著的權力關係等。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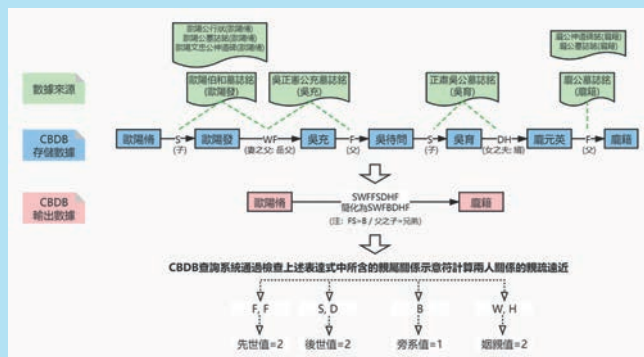
經歷了「語言學轉向」洗禮的當代歷史學家不再將史料看作對歷史事件的客觀忠實的記錄，但是歷史研究也不可能完全局限於對歷史書寫的分析和解構。透過文本挖掘歷史實態仍然是歷史學的重要使命。為此，歷史學家和其他領域的學者通力合作，設計文本標註算法、開發文本標註平台，對史料中的命名實體（如人物、地名、時間、職官等）及其關係進行標註，將非結構化的電子文獻轉化為半結構化的文檔（如XML或JSON文檔），或者進一步將已標註的數據提取出來形成結構化數據（如關係型數據庫、圖數據庫），再根據研究需要對這些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空間分析或社會網絡分析。這種類型的歷史研究和數據開發密不可分，整個研究流程涉及到數據挖掘、編排、重組、分析等多個步驟，數字技術在每一步中都不可或缺。通過多學科學術團隊的努力，近年來各種綜合型或專題型的結構化和半結構化數據資源不斷湧現，為探討佛教社群、官僚選任、士大夫的婚姻關係與學術交往等一系列宗教史、社會史、思想史課題開闢出廣闊的前景。這類研究往往帶有年鑒學派的烙印，關注長時段的歷史嬗變和結構性因素。它幫助研究者從微觀層面的複雜數據中發現宏觀層面的規律性特徵，從而在宏、微觀分析之間搭起橋樑。⁶

⁴ 一些從數位典藏起步的全文資料庫和學術期刊數據庫在提供傳統的全文檢索功能之外，也開始以擴展工具等形式提供部分文本分析功能，如Donald Sturgeon的Chinese Text Project: Tools（網址：<https://ctext.org/tools>）。使用數字技術對海量文獻進行分析時，研究人員通常需要訪問有版權保護的後台數據。因此，版權方和技術開放人員也嘗試不同的解決方案，如ProQuest LLC的TDM Studio（網址：<https://about.proquest.com/en/products-services/TDM-Studio>；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The Rise Project（網址：<https://rise.mpiwg-berlin.mpg.de>）。

⁵ 後文談到的結構化數據也可以用於對思想觀念和歷史書寫的研究，如Henrike Rudolph, “Structures of Empowerment: A Network Exploration of Women Activists’ Collective Biograph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Knowledge, Power, and Networks: Elites in Transition in Modern China*, ed. Cécile Armand, Christian Henriot and Hwei-min Sun (Leiden: Brill, 2022), 11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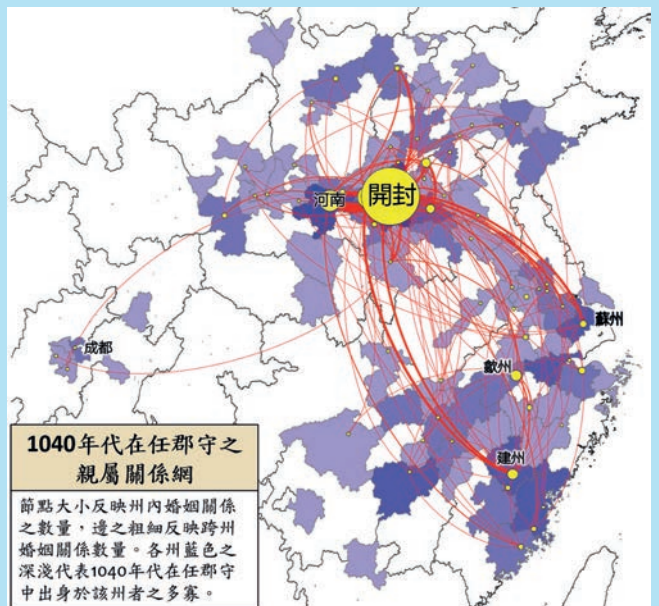
⁶ 梁晨、李中清：〈從微觀數據到宏觀歷史：作為橋樑的數字史學〉，《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第2期（2021年），頁84-92。

數字技術在歷史研究的價值集中體現在它處理複雜數據 (complex data) 的能力上,⁷但數字技術也有其局限。在研究中重視量化證據絕不應該導致歷史學家主體性的缺失。事實上,從問題設定、研究設計、數據篩選到分析過程中的參數設置,研究者的每一個判斷都影響著數據分析的最終輸出結果。不僅如此,這個輸出結果本質上也只是對數據化史料在總體水平上所做的量化描述,這樣的描述不能等同於歷史論述。史料中既存在大量無法量化的敘述性內容,也存在種種扭曲和缺失,這些偏差會不可避免地反映在量化分析結果中。當代歷史學家既已不再將史料視作客觀忠實的歷史記錄,自然也不能不加批判地把有關數據化史料的量化描述等同於對歷史實態的刻畫。因此,從得到數據分析結果到形成歷史論述的過程,給歷史學家留下了巨大的詮釋空間。儘管使用數據技術開展的歷史研究強調「讓數據說話」,具有實證主義色彩,但是即便是在這樣的研究中,歷史學家仍需結合史料批判、文本細讀等傳統研究方法對數據分析結果予以評估和解讀,將量化證據和歷史詮釋融為具備說服力的歷史論述。



圖一：史料數據化示例

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 (CBDB) 項目以關係型數據庫形式對史料中挖掘出來的親屬關係資料進行編碼和彙整,有助於學者發現史料中未曾直接提及的人物關係。相關討論可參考包弼德、王宏旻、傅君勳、陳松、柳舟、朱厚權:〈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 (CBDB) 的歷史、方法與未來〉,《數字人文研究》第1期 (2021年),頁 21-33。
(圖片由作者提供)



圖二：使用數字技術分析複雜數據

本圖利用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 (CBDB) 中的親屬、任官及籍貫數據,結合空間分析和社會網絡分析探討1040年代主政州級政區的宋代官員彼此之間的血緣關係和聯姻關係。對該網絡的詳細分析,見: Song Chen, "Governing a Multicentered Empire: Prefects and Their Networks in the 1040s and 1210s," in *State Power in China, 900-1325*, e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aul Jakov Smith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 101-52。
(圖片由作者提供)

⁷ 「複雜數據」是比「大數據」(big data) 含義更廣的概念。分析非結構化數據時,研究者通常都會遇到文本向量空間維度高而數據量稀疏的問題;分析社會網絡數據時,每增加一個節點或一條邊,就會讓某些分析指標的計算難度成倍增長;而很多歷史研究更需要將研究對象的時空分布特徵與其社會關係網中的地位互相參照。這些數據集的規模未必很大,但是其高維度、多變量等特徵極大地增加了它們的分析難度,或可統稱為「複雜數據」。除了大數據之外,對這類數據的分析也是數字技術的重要應用場景。

數字人文與中國哲學

「數字人文」亦稱為「數位人文」或「人文計算」，現已成為跨領域、跨學科交叉研究和人文社科領域的熱點。它首先表現為以計算、檢索、存儲等工具化角色應用、服務於包括哲學在內的各人文社會科學，帶來研究範式的革新；哲學既能提供有關認知、邏輯、理性等理論支撐和思想架構，也進行技術批判和理論反思，深化數字人文技術的理論基礎；二者的互動交融是必然、普遍的，在中國地理、歷史、文化、語言環境下還將呈現出獨特面貌。

技術工具從未遠離哲學，它們是勞動與心靈的結晶，也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人類思想和行為。1980年代初，錢鍾書宣導把電腦技術引入中國古典文獻研究；幾乎同時，臺灣學者開啟「史籍自動化項目」，而後出現「漢籍全文資料庫」、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電子佛典集成」等一批優秀成果；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建立「先秦兩漢全部傳世文獻電腦化資料庫」，出版了漢達古籍索引資料庫。¹這些具有開啟性和代表性的數據集成與其他類似工作，為中國傳統哲學、漢語哲學研究提供了較為全面的數字化文本、快捷的檢索和海量存儲功能。

隨著數字人文技術與應用在短期內快速提升，哲學與數字人文結合越發緊密。當前基於哲學思想文本的知識圖譜項目，如「宋元學案知識圖譜視覺化系統」，在文本挖掘、數據分析、結果呈現等許多方面都別具優勢；而圍繞儒、釋、道文化建立數字人文平台也進入學者視域。²如果說電腦自然語言處理分析哲學文本尚局限於語音、詞彙與語法等研究，以數字人文方法探討文本的哲學思想，乃至重新建構文本與文本性觀念，則觸及思想研究之核心，如借助語料庫進行主題建模，分析模型數據的文本意義，挖掘其中的哲學意涵，實現對文本意義的「遠距離」閱讀，並對模型研究方法融入哲學研究加以反思。³

¹ 趙薇：〈數字時代人文學研究的變革與超越——數字人文在中國〉，《探索與爭鳴》第6期（2021年），頁191-206、232-233。

² 胡士穎：〈道教數字人文平台建設芻議〉，《中國道教》第6期（2019年），頁46-49。

³ 如高元昊、王小紅、科林·艾倫、楊劍：〈主題建模輔助哲學研究的方法論探究——以《論語》《孟子》《荀子》的計算分析為例〉，《數字人文研究》第2期（2021年），頁36-50；鈕亮：〈《論語》的觀念結構——一個數字人文的視角〉，《圖書館論壇》第2期（2021年），頁1-12。

儘管關於數字人文方法的效用還有待探討，但在文本對象、範圍和資訊重構上已經迥然不同，⁴基於傳統哲學、漢語哲學研究將在數字人文時代獨樹一幟。此外，數字人文研究方法與數字技術帶來的生活元素，預示著一種具有時代特徵的美學研究範式正在形成，⁵而哲學各分支及其整體研究的新範式必將應運而生。

技術應用是數字人文「嵌入」哲學研究，而針對數字人文展開的哲學批判則是二者深入對話的特殊形式。數字人文與人工智能的發展不斷挑戰固有的價值觀念，中國學者針對技術（工具）理性無限膨脹而價值理性失落表現擔憂，對數字化生存和生存的數字化展開討論，防止人類世界被數字人文技術抽象為一堆數字、數據、符號或圖形的異化現實；⁶而基於道德觀念、生命倫理、理念信仰、科技哲學的接受、反思與批判，反映出學界對數字人文的猶疑、否定與陌生。數字人文還未根本改變傳統人文科學知識的文本生產方式和存在形態，有關「後數字人文時代」的探討已然開始。⁷

作為新型知識生產的數字人文正遭遇自身理論缺失的困境，哲學思想及其學科內容、思維方式、學術方法是理解數字人文現象、問題回應和理論建構的重要途徑，諸如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現代與後現代主義等豐富而複雜的思想是理解數字人文學興起的思想根基，而傳統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哲學有助於進行數字人文學的思想還原和理論建構，解構主義、現象學、存在主義等能夠揭示數字人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普遍的科學技術問題並以其批判性加深對於數字人文複雜性、未來性的認知。哲學主動介入數字人文學，有利嘗試解答和澄清學術界對數字人文的迷茫、批評和誤解，這是數字人文學的新需求，也是人文學理論自我適應與更新的內在要求。

數字人文與中國哲學研究的交融，是資訊技術發展和當前科研範式締結之果，也與學界開放、包容、創新氛圍息息相關。可以預見，哲學數據庫、知識圖譜仍是近些年發展主流，數字人文與哲學歷史、文本研究、理論批判將繼續深入，現有的概念史研究中的數字人文方法預示著哲學思想研究的方法正在轉型。總之，數字人文技術通過納入科技哲學和基於思想探索的哲學文本挖掘則向哲學研究的核心進發，現有的哲學教育模式、學科範式面臨衝擊、改變和重塑。

⁴ 陳靜：〈數字人文視野中的文本與文本性問題反思〉，《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8期（2020年），頁172-180。

⁵ 范玉剛：〈文化轉向與數字人文視域中的美學研究範式重構〉，《中國高校社會科學》第1期（2020年），頁124-134。

⁶ 廖祥忠：〈「超越邏輯」：數字人文的時代特徵〉，《現代傳播》第6期（2005年），頁23-25。

⁷ 李河：〈從「代理」到「替代」的技術與正在「過時」的人類〉，《中國社會科學》第10期（2020年），頁135。

數字人文與話劇研究

當前的話劇研究頗顯得有些冷清。在兩岸三地的文藝生態、文學觀念中，話劇的地位難及小說、詩歌等文體，而弘揚民族文化的時代語境，又導致話劇這種「舶來」的現代藝術，難以與傳統戲劇（曲）爭鋒。同時，由於話劇自身的藝術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在現代消費文化環境中難以走向通俗化、大眾化。因此可以說，話劇藝術在當前面臨著市場小眾化、學界邊緣化的困境。

但「數字人文」的興起，為話劇藝術的發展及創新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目前關於話劇藝術的研究，主要分佈在藝術學和現代文學研究兩個研究。與藝術學領域的話劇研究尚未充分注意「數字人文」這一新潮相比，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學者王賀已提出「數字人文」與之結合的兩種路徑，一是建構「數字文獻學」，二是開拓「數字現代文學」研究，前者側重於對文獻的數字化收集、整理和保存，後者則強調利用數字化的文獻和各種數字方法、技術，展開研究，拓展現代文學研究的深廣度。¹雖然「數字人文」跟現代文學研究的結合尚處於試驗階段，但相關的探討無疑對於希望尋求突破的話劇藝術及其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鑒和參與的思路、方案。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數字人文與話劇研究結合的路徑，似亦可分作「數字話劇」研究和「話劇數字化」兩個方面。

首先，對於話劇而言，由劇作者、文本、受眾和其他傳播主體構成的文藝生態系統中，存在著更為複雜多維的關聯式結構，無論是劇作者身份、文本形式、閱讀或接受的途徑、傳播方式，都存在多元內涵，非常貼合數字人文的核心功用，即包含量化的文本編碼、數據解析和視覺化的空間知識表示等。通過數字化方式將話劇藝術的繁雜資訊進行具像化演繹，可以實現話劇從靜態的研究對象轉化為具體靈動的應用場景，啟動其舞台藝術的固有魅力，從而為話劇研究的現實意義賦值。在這一方面，近來興起的「文學地圖熱」提供了一種富有操作性的經驗。在劇作家層面利用視覺化技術能夠呈現其生平交際和生活軌跡，繪製不同時代劇作家區位分佈和地域文化譜系視圖。從劇本角度開展數據庫建設，為話劇研究確立結構化、體系化的研究資源。在話劇藝術實踐和傳播維度，將包括舞台、演出、宣傳、劇團等話劇在文化制度層面的內容進行數字化、建設數據庫，能夠為分析話劇發展的歷史背景和命運變佐以生動直觀的參照，有助於推動現代話劇以完備和便利的文獻資料保障機制吸納和聚合研究力量，進而促進當下話劇藝術創作及展演活力。

¹ 王賀：〈數字人文如何與現代文學研究結合〉，《現代中文學刊》第1期（2019年），頁78-80；王賀：〈數字人文取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問題與方法〉，《文藝理論與批評》第2期（2020年），頁33-38。

其次，「數字話劇」和「話劇數字化」除了在內容上能夠為話劇研究創造發展前景之外，亦可以成為話劇研究的新論域，從研究方法、研究空間到理論話語都具有豐富的學術構建可能。如將傳統話劇側重於「述學」、「史論」等方向的研究，拓展至利用數字技術轉化為融合文字、聲音、影像、實景等一體的學術成果呈現，促進平面研究向立體研究的轉變；在研究對象和範疇上，可以思考突破傳統的作家論、文本論等拘囿，開放式地通過數字化還原技術，將話劇的「本事」研究、場景研究、器物研究等整合起來，拓展話劇藝術的研究空間。另外，「數字人文」以「技術賦能」為文化藝術創作構建了全新的環境，必然會催生出新的文藝現象，隨之推動文藝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而探究「數字人文」如何結合話劇研究，這本身就構成了一個新的學術課題。

當然，「數字人文」與文學藝術研究的結合仍處於理論探究的階段，需要更多的研究成果來踐行和回應這一議題。值得強調的是，打開數字人文研究、實踐的新局面，首先應有跨學科的協作意識，特別是像話劇這種具有較強的舞台實踐、社會傳播特徵的藝術門類，開展學術研究更應該走出學術圈的互動，增強學界跟社會的聯動。話劇的創作、演出等環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市場等條件的吸引、限制，話劇研究也可尋求外界協作，使學術團體和社會力量、資源實現共贏。同時，研究者需要主動提高對數字人文相關工具、平台的熟悉程度和使用熟練程度。數字人文的跨學科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相關研究需要不同學科背景學者的支援，科學的團隊組織建設較為迫切。此外，如專業學術期刊平台的創建、學術會議的召開以及相關培訓的開展，同樣也會促進數字人文的理論交流和成果產出。

由於數字技術、方法不斷變化與「新文科」建設的持續推進，具有計算思維和交叉學科特質的「數字人文」，在中國學術界正以可預見的姿態不斷獲得進步和發展。與此相應，作為傳統學術研究範疇的話劇研究，也將在與「數字人文」的融合下產生更多研究，無論是舊題新議還是新題挖掘，都將呈現出知識生長和表示的別樣活力。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副教授、創意藝術學系系主任、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主任

數字人文視野下的 現代文學史料研究 ——以張愛玲研究為例*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版本和史料研究方面，過去由於地緣政治和歷史因素，使研究者難以全面搜尋史料和文本資料，以致出現很多難解的問題，或受到忽視的現象。以張愛玲研究為例，張愛玲在上海淪陷時期發表的作品跟後來收入小說集和散文集的版本就出現了非常不同的面貌。然而由於這些文本資料過去散落在各地的圖書館，有些更只有民間收藏，研究者未必能一一得見全貌，只能通過四處訪尋，再作逐一的文本比對，才能整理出文本的演變史，讓讀者得見作品的真實面貌。筆者過去曾發表論文〈張愛玲小說的版本問題：以《第一爐香》、《第二爐香》和《茉莉香片》為例〉，通過比對《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和《茉莉香片》由初刊本、初版本、增訂本、皇冠本、全集本、十月本到典藏本的演變，提出為張愛玲作品版本異文作復原性整理和匯校性整理的必要性。¹這些研究都是未有數據庫運用前的研究方法，但是，在研究方法和視野上，仍然有很多問題未能解決。

近年，中國現代文學在考據和史料整理方面逐漸獲得學術界的重視，由於篇幅所限，以下只列舉數例，例如吳福輝對現代文學史料邊界的開拓、金宏宇討論現代文學的考證方法的重要性以及新文學研究的版本問題、陳子善多年有關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研究、劉增杰對史料的再閱讀等。²另外，《新文學史料》、《史料與闡釋》等學術期刊和集刊，以及「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與闡釋學術研討會」等學術出版和活動，都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文獻研究帶來重要影響。在張愛玲研究方面，陳子善、周楠等學者致力於史料方面的研究，為這方面的研究帶來舉足輕重的貢獻。隨著數字人文研究的興起，以及各大數據庫的建立，例如《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中國近代報紙全文數據庫》（1850-1951）、《中國近代圖書全文數據庫》（1840-1949）等，更大大為相關學術範疇的研究提供方便。

* 本論文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授予研究金額資助，編號為UGC/FDS16/H02/17。

¹ 梁慕靈：〈張愛玲小說的版本問題：以《第一爐香》、《第二爐香》和《茉莉香片》為例〉，《書目季刊》第48卷第1期（2014年6月），頁87-107。

² 以下只列舉一些關於幾位學者的研究著作為參考。參見吳福輝：〈歷史與當下：雙重視野中的現代文學資料學〉，《學習與探索》2004年第1期，頁109-111；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金宏宇：〈考證學方法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12期，頁156-175和202-203；金宏宇：《新文學的版本批評》，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陳子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陳子善：《不為人知的張愛玲》，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劉增杰：《發現與闡釋：現代文學史料知見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不少人認為只要運用數據庫，已經可以迅速找尋研究資料，研究者不需要再花很大的心力。但是，在更為方便找尋資料的同時，亦帶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維改變的要求。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除了「找到了」的價值，研究者更要問的是，在擁有數據庫的方便以外，我們如何應用數據庫去獲得更高的研究價值和更廣闊的研究視野？以張愛玲研究為例，筆者認為有以下問題可以使用數據庫去深入研究。

首先，研究者可以借助數據庫去理解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係，而不再停留於個別文本的解讀之上。例如張愛玲曾寫有兩篇散文名為〈必也正名乎〉和〈「卷首玉照」及其他〉，前者寫於1944年1月，後者寫於1945年2月。過去如果沒有利用數據庫整理的史料，我們未必了解為什麼張愛玲會寫這兩篇關於名字和照片的文章。借助《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我們可以發現，原來在1943年11月16日，《力報》曾刊有一篇文章批評張愛玲的名字，³張愛玲於是寫有〈必也正名乎〉作回應；⁴而在1944年8月24日的《力報》，文海犁曾評論《傳奇》內張愛玲的照片和簽名，⁵張愛玲是對這篇文章作回應。⁶如此一來，研究者就可以把個別的文本放到一個更全面的語境下去理解。

第二，在局部和單篇的文獻研究以外，研究者可以通過數據庫去整理大規模和整體全面的文學場域全貌。我們過去對淪陷時期的張愛玲在上海場域中的創作情況所知並不全面，特別是在抗戰勝利後，上海文學場域中對她的評價如何，跟她中後期創作的關係如何等等，研究者都只能透過其他文人的回憶和評論去歸納印象。通過數據庫的協助，今日的研究者可以全面了解上海的主要報刊和大量的小報是如何通過輿論去主導想像張愛玲的力量，甚至可以透過歸納整理各種數據資料後，確切得出作家在不同年代的創作與報刊評論的關係，明確了解個別作家如何被文學場域的各種勢力所影響；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甚至可以比較上海文學場域、臺灣文學場域和香港文學場域想像一個作家的差異。

筆者於2017年獲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授予研究金額資助，進行名為「多重文化場域中的張愛玲：從報刊看中港台三地對『張愛玲』的『形塑』與『被形塑』」的研究計劃，主要就是從不同的數據庫中對大量的資料進行搜尋和整理，比較不同文化場域對張愛玲的想像和形塑方向，並發表了幾篇有關上海時期、香港時期和臺灣時期之文學場域與張愛玲其人其文關係的論文，進行了多個包括國族、性別、讀者接受等主題的比較。如果沒有數據庫的協助，研究者則很難達到大規模的地區性比較和深入研究，而只能從個別篇章的考據和挖掘入手。

³ 醉云：〈女作家〉，《力報》（1943年11月16日），頁3。

⁴ 張愛玲：〈必也正名乎〉，《雜誌》第12卷4期（1944年1月），頁70-72。

⁵ 文海犁：〈《傳奇》印象〉，《力報》（1944年8月24日），頁3。

⁶ 張愛玲：〈「卷首玉照」及其他〉，《天地》第17期（1945年2月），頁15。

張愛玲研究過去難解的地方，現在都能透過去數據庫協助處理大量的資料而成功解開，筆者總結以上的成果，於2022年出版了專著《想像與形塑——上海、香港和台灣報刊中的張愛玲》。本書除集合以上論文呈現研究成果，亦編輯了六十多篇刊登於1943至1949年上海報刊中有關張愛玲的報導，供研究者參考。同時，書中亦收入超過600條由1943至1949年中國報刊中有關張愛玲報導總目，每則均附有筆者所撰之提要，為研究者日後進行張愛玲研究提供更多線索。

本文以筆者近年的研究為例，說明了數字人文研究得到數據庫的幫助，打破過去現代文學研究在史料搜尋和整理上的難點和局限；但同時亦顯示了資料庫提供方便之餘，仍然需要研究者用大量的精力去梳理、編排和分析，才能把數字世界中機械化的數據資料，轉化成具有人文溫度和研究價值的有機材料。筆者上述的張愛玲與文學場域的史料研究只是一個開端，未來仍有更多關於同類型作家、女性作家群、刊物研究、場域分析的大規模研究可供發展；同時，一向備受忽視的史料，包括廣告史料、讀者參與史料、詩歌文評等都可納入數字人文研究的視野。通過數據庫的幫助，文學史料的研究當可達到金宏宇所言的「對文學史料的形構意圖、本質屬性、史料觀等進行更高層級」的研究。⁷



梁慕靈：《想像與形塑：上海、香港和台灣報刊中的張愛玲》，台北：秀威資訊，2022年。（圖片由作者提供）



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
(圖片來源：<https://www-cnblogs.com.ezproxy.lib.hkmu.edu.hk>)



張愛玲《傳奇》廣告，刊於《海報》1944年9月1日，第三版。（圖片由作者提供）



張愛玲：《第一爐香——張愛玲短篇小說集之二》，香港：皇冠出版社，1995年。（圖片由作者提供）

⁷ 金宏宇：〈考證學方法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12期，頁175。

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碩士、
安徽新華學院文化與傳媒
學院教師

數字人文視野下的 電子遊戲理論研究

電子遊戲自20世紀70年代末進入中國，已有四十餘年的發展歷史。有學者發現，從1984年《人民日報》上首次出現「電腦遊戲」一詞以來，其對電子遊戲的報導，總體呈現出負面報導先增後減的趨勢。¹這也與中國電子遊戲理論研究的發展過程及基本特徵相吻合，即早期電子遊戲理論起步較晚、學術研究與電子遊戲媒介發展現狀不相匹配，時至今日電子遊戲理論方逐步興起，學者們開始關注文學與電子遊戲之間的跨媒介現象等課題。可以說，電子遊戲理論研究，構成了當前學術前沿「數字人文」的又一個新領域。

概括而言，現階段中國電子遊戲理論研究的主要方向，便集中在對西方傳統遊戲或敘事理論的分析與應用上。董蟲草的《藝術與遊戲》（2004）及其發表的文章〈西方藝術遊戲論述評〉、〈虛擬論的遊戲理論：從斯賓塞到谷魯斯和佛洛伊德〉、〈胡伊青加的遊戲理論〉等，從歷史的角度對西方遊戲領域具有影響力的理論家進行介紹和引用。張新軍在〈敘事學與電子遊戲〉中認為數字媒介（電子遊戲）是脫離傳統西方敘事學之外的另一種話語模式。²關萍萍《互動媒介論：電子遊戲多重互動與敘事模式》（2012）中借鑒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過程哲學」的思想，指出電子遊戲中的敘事模式應是「過程敘事」，即一種非線性多重敘事結構，³強調「互動」是電子遊戲區別其他媒介的主要特徵之一。與此同時，王貞子在《數字媒體敘事研究》（2012）中回顧傳統媒介的線性敘事的特點，提出電子遊戲在借鑒線性敘事的基礎上創造了後線性敘事模式，這種模式包含多種線性敘事線，玩家利用電子遊戲雙向互動的特點影響遊戲情節的走向，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親身參與，⁴在針對互動性問題上，提出既肯定傳統媒介自身存在互動性，又強調雙向互動因電腦技術得以全面發展的折中觀點。黃佩於2017年出版《傳播視野中的電子遊戲——技術與文化的互動和創新》，在探討電子遊戲互動問題上與關萍萍類似，認為互動過程可分為玩家與媒介傳播的內容互動、玩家與操控媒介的行為互動、玩家與其他玩家之間互動三個類型，豐富了我們對遊戲與玩家、技術、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的理解。⁵

¹ 何威、曹書樂：〈從「電子海洛因」到「中國創造」：《人民日報》遊戲報導（1981-2017）的話語變遷〉，《國際新聞界》第5期（2018年），頁57-81。

² 張新軍：〈敘事學與電子遊戲〉，《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6年），頁53-58。

³ 關萍萍：《互動媒介論：電子遊戲多重互動與敘事模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75-176。

⁴ 王貞子：《數字媒體敘事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28-131。

⁵ 黃佩：《傳播視野中的電子遊戲——技術與文化的互動和創新》（北京：北京郵電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90-93。

另一方面，教育學、心理學等領域的眾多研究者對兒童、青少年遊戲的使用及遊戲中表現的心理特徵與實踐也進行了探討。李思屈的《數字娛樂產業》（2006）、《傳統產業化時代的審美心理》（2008）從整體上對電子遊戲的產生、發展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對玩家的遊戲心理與遊戲行為動機進行探討，他認為在遊戲中，人的遊戲本能來源於人的「節能備變」，在不用勞動的休閒時間內人們通過遊戲保持工作的能力，為成年之後的可能面對的問題做準備，尤其是兒童遊戲是對未來生活的一種無意準備、是為成熟作預備性練習的準備。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與康德、席勒等相同。在遊戲暴力與成癮研究方面，張春良做了大量的社會實踐調查，著有《網路遊戲沉思錄》（2005）；趙宏明和孫延軍通過定量分析遊戲與暴力之間的相關性，綜述了暴力遊戲對青少年心理機制的影響。⁶

隨著中國自主研發信息技術能力的提高，學者們在逐漸肯定電子遊戲有其存在意義、價值的同時，也提出了許多全新的觀點，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特點。趙東川梳理往年電子遊戲在中國的發展歷史，提出中國學者研究電子遊戲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並從遊戲語義、研究環境、本體研究現狀三個方面分析了中國電子遊戲理論構建面臨的困難。⁷嚴鋒則主要利用電子遊戲特徵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其論文〈假作真時真亦假：虛擬現實視野下的《紅樓夢》〉借助遊戲虛擬呈現、沉浸感和交互性重新闡釋《紅樓夢》的魅力所在，⁸此外他還反觀電子遊戲與多媒介之間的融合現象，提出應把遊戲置於更大的藝術環境與文化背景下，肯定了遊戲的文化驅動力。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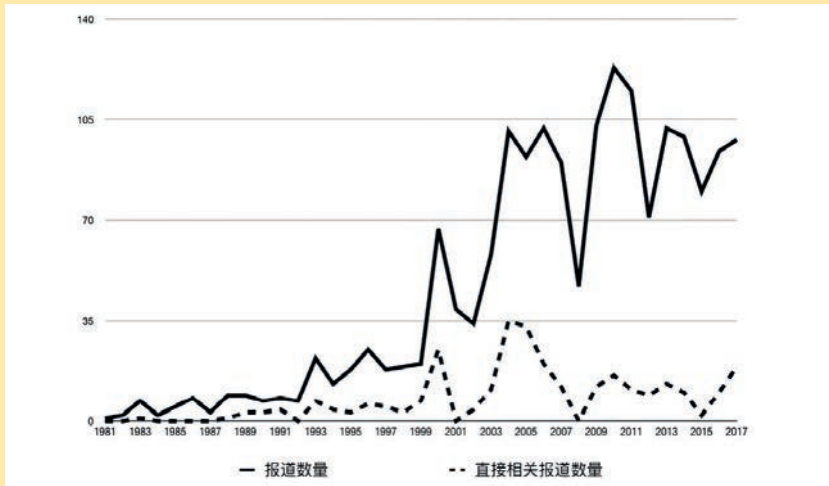
總之，在數字人文研究興起的浪潮下，電子遊戲理論研究將迎來發展的春天。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把跨媒介敘事研究的眼光投向電子遊戲領域，而正視遊戲中的利弊、文學與科技相互結合、深入研究遊戲理論，進而利用數字技術、方法開展新的研究，也都是未來中國電子遊戲理論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

⁶ 趙宏明、孫延軍：〈暴力電子遊戲對攻擊行為及相關變量的影響〉，《心理科學進展》第2期（2006年），頁266-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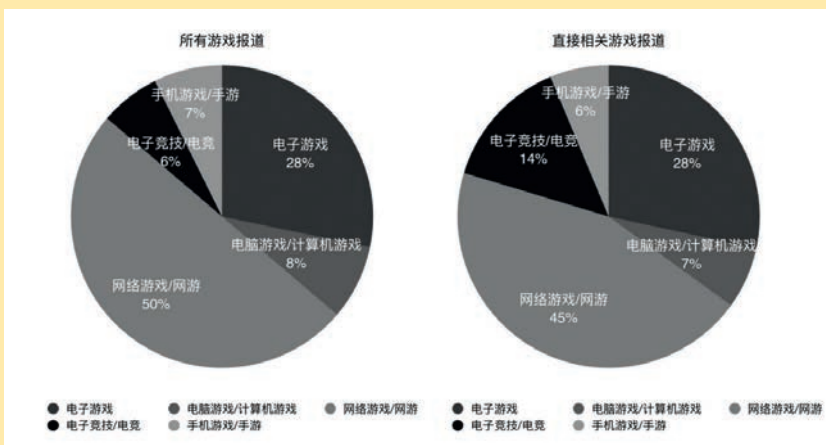
⁷ 趙東川：〈中國電子遊戲理論研究的多重困境及當下態勢〉，《當代動畫》第4期（2019年），頁14-17。

⁸ 嚴鋒：〈假作真時真亦假：虛擬現實視野下的《紅樓夢》〉，《中國比較文學》第2期（2020年），頁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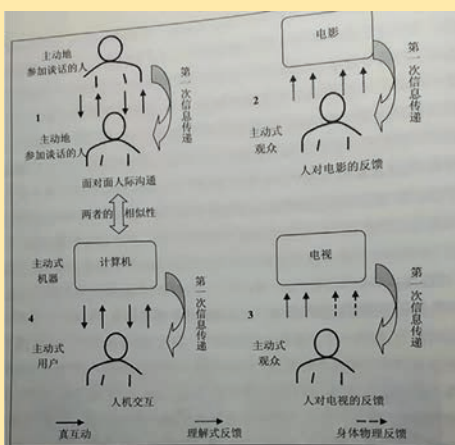
⁹ 嚴鋒：〈遊戲化生存：未來的藝術與藝術的未來〉，《上海文化》第2期（2021年），頁109-117。



圖一：
1981年-2017年《人民日報》遊戲報導和直接相關報導數量
(圖片來源：何威、曹書樂：〈從「電子海洛因」到「中國創造」：
《人民日報》遊戲報導(1981-2017)的話語變遷〉，《國際新聞界》第5期
(2018年)，頁63。)



圖二：
1981年-2017年《人民日報》遊戲報導和直接相關報導中採用
不同關鍵詞頻次的比例
(圖片來源：何威、曹書樂：〈從「電子海洛因」到「中國創造」：
《人民日報》遊戲報導(1981-2017)的話語變遷〉，《國際新聞界》第5期
(2018年)，頁63。)



圖三：
傳統敘事媒體反饋與計算機相關媒體互動的對比
(圖片來源：王貞子：《數字媒體敘事研究》
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74。)

科技藝術： 數字人文研究新領域

在中國數字人文研究中，除了偏重數字技術、方法、工具、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探討，許多學者仍從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哲學等領域出發，尋求其與數字人文的結合路徑，探索可以展開數字人文取向的新研究的理論、方法與實踐。但與這些擁有悠久歷史的研究領域相比，當代藝術、文化似乎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可以進行數字人文研究的可能。科技藝術這一天生具有數字屬性的當代藝術領域，正是其中之一。

從上世紀90年代興盛的「新媒體藝術」，到21世紀初出現的「數字藝術」，到2005年後出現的「生物藝術」，再到2010年興起的「科技藝術」¹——在藝術與科技「聯姻」的過程中，在特定實體空間內展示的繪畫、雕像、表演、裝置等傳統意義的藝術的邊界已變得越發模糊，相反呈現出科技藝術化、藝術科技化的趨勢。隨著科技與藝術的不斷融合，兩者之間呈現出三種彼此聯結但又有所不同的關係：1. 科技作為藝術創作的載體或工具。例如一幅圖像，最早是一幅壁畫，到在畫布上臨摹，到大批量掃描印刷，到用照相機拍攝，再到用軟件繪製、編輯，藝術創作工具的更新得益於科技的發展。2. 科技作為藝術的傳播媒介。一方面，類似Google Arts & Culture的軟體或平台虛擬化藝術欣賞的空間，拉近了藝術與大眾的距離；另一方面，藝術展通過虛擬實境、增強現實技術給觀眾帶來前所未有的感官衝擊的同時帶來沉浸式的觀賞體驗。3. 科技為藝術的消費創造條件。這是一種最為複雜的關係，代表了科技深度參與並融入藝術創作。典型的例子有AI畫作《愛德蒙·德·貝拉米肖像》（Portrait of Edmond de Belamy, 2018）、Google的Deep Dream項目、「機器人藝術家」PIX18等，科技似乎某種程度地替代人類成為藝術創作的主體。在後兩種關係中，科技不再只是作為人類創造藝術的工具，而是與人形成海勒（N. Katherine Hayles）所謂的「認知集合體」（Cognitive Assemblage）。²儘管電腦沒有意識，但它接收人類輸入的信息並經過深度學習後，再以特定規則輸出新信息即是一種認知行為，而這種認知行為中就包含了人機的互動；在之後的傳播和展示過程中，電腦能根據人的行為或指示作出反應，便形成了電腦與觀賞者之間的互動，形成由人類、非人類和認知媒體組成的「認知集合體」。

¹ 譚力勤：〈科技藝術——藝術歷程中又一關鍵轉捩點〉，《中國美術報》，2020年11月17日，網址：<http://www.zgmsbweb.com/Mobile/Index/articleDetail/relald/25547>，瀏覽日期：6/8/2022。

² N. Katherine Hayles, *Postprint, Books and Becoming Computation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8.

孫周興先生指出，科技藝術不同於傳統藝術的特點，在於其所包含的「人類世」、「無界」、「觀念」、「奇異性」、「抵抗」和「未來性」這幾個元素。科技藝術的產生背景是「人類世」即技術統治的時代。遵循「創制 (poiesis) 即揭示即真理 (aletheia)」的原則，用「奇思妙想、陌異化、神秘化、非同一化」的方式反映世界事物及人類行為的異質性，進而形成藝術的去邊界化或跨媒介——包括媒介無界（從實物轉向虛擬）、樣式無界（藝術樣式多元化、藝術與哲學）、人際無界（「人人都是藝術家」）——來抵抗千篇一律的同質化進程，或抵抗媚俗，抵抗制度，抵抗集權，最終從尚古轉向未來，具有弱自然性（技術性）、觀念性、未來性的特徵。³ 科技藝術對傳統藝術既有繼承和延續，又有某種轉向和跳躍。

儘管科技藝術給傳統藝術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引發了人們的反思。我們首先發現，科技作為藝術的傳播媒介（主要通過3R技術）⁴帶來的結果是對空間的重塑。我們所熟悉的空間可能不再是真實的空間，如福柯所言：「我們生活在一個佈滿各種性質，一個可能同樣被幻覺所縈繞著的空間中……我們所生活的空間，在我們之外吸引著我們的空間，恰好在其中對我們的生命、時間和歷史進行腐蝕的空間。」⁵既然空間能被塑造，它也能被控制。如果說過去的透視是一種純粹的將平面空間化的藝術技巧，那麼3R技術重塑的卻是人們對空間的感知，而這種被重塑的空間的感知又會重新塑造主體。⁶由此，科技不再只是作為傳播藝術的媒介，而有借藝術的形式施加權力控制的可能。

³ 孫周興：〈未來藝術：幾個基本概念〉，《文化藝術研究》第14卷第5期（2021年），頁2-7。

⁴ 3R技術，即VR (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AR (Augmented Reality) 增強現實、MR (Mix Reality) 混合現實。

⁵ Michel Foucault and Jay Miskowiec,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1 (1986): 23.

⁶ 袁園：《空間：機器、腦與藝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與認知科學明德講壇，2021年9月11日，網址：<https://b23.tv/BPl4ykm>，瀏覽日期：3/8/2022。

此外，科技深度參與藝術創作顛覆了人們對藝術的傳統認知。面對人工智能「創作」的藝術，人們開始反思：藝術是什麼？藝術由誰創造？人工智能創作的作品是否能稱為藝術？藝術將走向何方？首先，藝術不再僅僅是人們所看到的。在一切皆可數字化的時代，藝術成為多層結構的生態，藝術的本質從表面隱藏到熒幕或界面之後，使得「對於代碼的解構正在成為一種新的藝術」。⁷此外，藝術史作為一種歷史敘事，將其原本對於人的關注轉變為對於人與機器的關注：從傳統藝術到「數字藝術」到「科技藝術」再到未來的「奇點藝術」的進程就記錄了科技進步的歷史以及人機關係的轉變。再次，我們所看到或所認為的藝術的「創作者」（即機器人或人工智能）並非是真實的藝術家——有多少智能，其背後就有多少人工——目前，人工智能還處於弱智能階段，我們未必要有「普羅米修斯的羞愧」心理，⁸因為人工智能的創作是對人的藝術的模仿，它們並沒有自己的創作意圖和自己的意識。但值得注意的是：1. 作為人的藝術家應更加多元：傳統意義上的藝術家沒有技術人員就無法完成「數字藝術」的創作，所以技術人員也應該屬於創作主體中的一員；2. 藝術媒體傳統的歷史敘事應轉向媒體的物質性⁹：只有理解了機器實際的工作方法，才能在智能能夠獨立於人創造意義的時候讓人們知道如何應對；3. 技術給藝術「祛魅」後又重新「賦魅」——不只掌握特殊技巧的藝術家能創作藝術，任何掌握技術的人都可以生產藝術作品——當藝術作品作為非同質化代幣（NFT）進入元宇宙後，作為生產和貨幣的藝術因為科技的參與而不可避免地被資本裹挾，逐漸偏離了源於內心的純粹藝術。4. 人工智能創作的藝術是否是藝術的判斷的主導權其實還在於人，當人工智能發展到強智能階段或突破「奇點」後，有可能會把藝術的話語權讓渡給機器，當然這不是人類想看到的。

因此，在科技藝術盛行的時代，也許我們要思考的最根本的問題是：人類如何在與人工智能更好地合作中站穩藝術創作的主體地位？



圖一：
Male portrait Edmond de Belamy
by Obvious (collective)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右下角的作者
簽名是一串算法
(圖片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mond_de_Belamy)



圖二
(圖片來源：<https://deepdreamgenerator.com>)



圖三：
Man by PIX 18 at
Columbia University
(圖片來源：<http://www.pix18.com>)

⁷ 凱薩琳·海勒斯：《誰是藝術家？》，上海：AAI藝術與人工智能國際論壇，2021年5月20日，網址：<https://b23.tv/79SxSiB>，瀏覽日期：2/8/2022。

⁸ 「普羅米修斯的羞愧 (Promethean Shame)」由德國哲學家安德斯 (Günther Anders) 提出，指人在技術和機器面前所感到的一種自嘆不如的羞愧。

⁹ 章戈浩、張磊：〈物是人非與睹物思人：媒體與文化分析的物質性轉向〉，《全球傳媒學刊》第6卷第2期 (2019年6月)，頁103-115。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2022年活動概要



專題講座

Curating the Chinese Section of the Art Deco Exhibition

講者：香港城市大學展覽館總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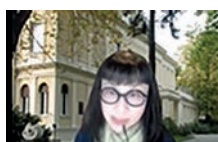
(Director of the Exhibition Galle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范懿莎博士 (Dr. Isabelle Frank)

日期：2022年3月2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2:00-3:00

形式：網絡講座



公開講座

「活現中華文化X走進創意藝術校園系列」網絡講座系列

講座一

主題：從中國畫思考文字創作

講者：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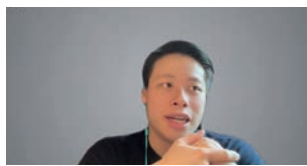
創意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羅展鳳博士

日期：2022年4月1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2:00-3:00

形式：網絡講座



講座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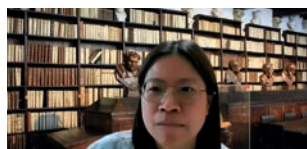
主題：當代水墨美學與創作

講者：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創意藝術學系講師
梁望琛先生

日期：2022年4月6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1:00-12:00

形式：網絡講座



講座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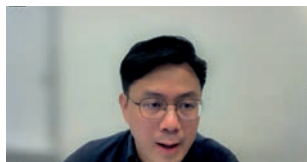
主題：社交媒體廣告體驗工作坊

講者：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創意藝術學系高級講師
劉文英女士

日期：2022年4月8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00-3:00

形式：網絡講座



講座四

主題：數碼水墨動畫

講者：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創意藝術學系高級講師
麥盛豐先生

日期：2022年4月21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3:00-4:00

形式：網絡講座



講座五

主題：中國文化藝術在數碼互動媒體中的演現

講者：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創意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黎智富博士

日期：2022年4月28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00-3:00

形式：網絡講座



專題講座

漢字與古代動物世界

講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潘銘基教授

日期：2022年4月8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6:00-8:00

形式：網絡講座



公開講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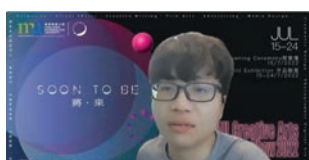
數碼水墨藝術在當代藝術的發展

講者：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創意藝術學系高級講師
麥盛豐先生

日期：2022年4月14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3:00-4:00

形式：網絡講座



公開講座

Interactive Experience Development and Trends on Arts & Culture

講者：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創意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黎智富博士

日期：2022年4月22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4:00-5:00

形式：網絡講座



專題講座

「虛擬偶像」會閱讀莎士比亞嗎？

講者：青年作家
程皎暘女士

日期：2022年5月7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11:00

形式：網絡講座



專題講座

「中華文化與藝術體驗課程： 粵劇文化導賞」專題講座

講座一

主題：演出藝術

講者：吳立熙先生、陳紀婷女士

日期：2022年6月14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6:00-8:00

地點：戲曲中心2樓演講廳

講座二

主題：粵劇化妝與穿戴

講者：莫華敏先生、謝曉瑜女士、

陳紀婷女士、黃可柔女士

日期：2022年6月21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6:00-8:30

地點：戲曲中心2樓3號排演室

講座三

主題：音樂與唱腔示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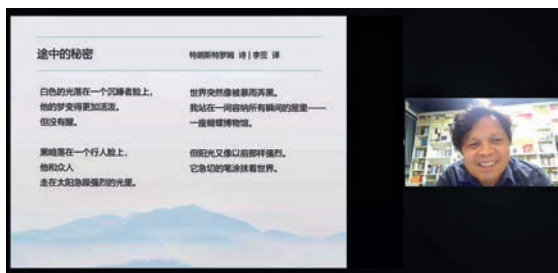
講者：何晉熙先生、廖俊熙先生

日期：2022年7月12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6:00-8:00

地點：戲曲中心2樓演講廳





專題講座

當代詩的寫作現場與國際視野 ——談「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 及其獲獎詩人

講者：著名詩人、一級作家
黃禮孩先生

日期：2022年7月13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7:00-8:00

形式：網絡講座



專題講座

論盡你阿媽愈矛盾愈好看 ——戲劇性人物寫作

講者：香港著名舞台劇演員及劇作家
黃詠詩女士

日期：2022年7月30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12:00-1:00

形式：網絡講座



導賞活動

無障礙賞非遺 ——花牌工場導賞

日期：2022年7月23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9:00-下午1:00

地點：元朗



頒獎活動

廣播劇X中華文化「古代傑出人物選舉」頒獎禮

與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創意藝術學系合辦

日期：2022年8月16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4:00-5:00

地點：香港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三樓
呂辛(振萬)演講廳(D0309室)



展覽

廣播劇X中華文化 「古代傑出人物選舉」展覽

與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創意藝術學系合辦

日期：2022年8月4日至8月31日

時間：上午10:00-下午5:00

地點：香港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一樓展覽廊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聯同 創意藝術學系及救世軍田家炳學校開展 「品德教育動畫協作計劃」

2021至2022年度，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及創意藝術學系，與救世軍田家炳學校合作開展「品德教育動畫協作計劃」，運用有趣動畫呈現中國經典歷史故事，介紹歷史人物之餘，亦能提升小學生對品德學習的興趣。兩校師生合作無間，是次計劃開展成功完滿。

計劃第一階段：「品德達人影像化計劃」

「品德教育動畫協作計劃」首階段為「品德達人影像化計劃」，救世軍田家炳學校師生設計了堅毅萬能俠、承承博士、盡責隊長及Miss Ai Ai等多位品德達人，代表著堅毅、承擔、盡責、關愛等中華傳統美德。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及創意藝術學系動畫及視覺特效課程師生將這些設計製成動畫，讓這些品德達人活起來。2021年10月，在救世軍田家炳學校舉辦的「品德教育活動啟動禮」中，動態的堅毅萬能俠首次登場，透過老師的聲演，小學生能直接與堅毅萬能俠即場互動交流，不亦樂乎。



品德教育活動啟動禮

計劃第二階段：「品德達人故事新編」動畫製作

計劃第二階段，救世軍田家炳學校舉辦了「品德達人故事新編」寫作比賽，供小三至小四同學參加，創作中國經典歷史人物與品德達人的故事。比賽獲獎作品由香港都會大學創意藝術學系學生製成品德達人故事動畫系列。

是次寫作比賽獲獎作品共三篇。〈穿越時空見王獻之〉由3H班羅梓淇同學創作，獲得雙冠軍，講述了堅毅萬能俠與承承博士越過山洞回到東晉，認識了王獻之如何刻苦練字而成為書法名家的故事，說明堅毅的重要性。動畫部份由張嘉慧同學、陳雪冰同學及繆詠琛同學繪製。

〈穿越時空見愚公〉由3F班阮樺昕同學創作，亦獲得雙冠軍。故事講述堅毅萬能俠乘坐承承博士發明的時光機，回到古代尋找愚公。透過與愚公的對話，堅毅萬能俠學習到愚公堅毅不屈的決心和精神。動畫部份由鍾健新同學、李旨悅同學、林珈穎同學及馮芷茵同學製作。

〈遇見司馬光〉由4H班曾海晴同學創作，獲得季軍。故事講述盡責隊長透過承承博士的隨意門到了北宋，遇見年少的司馬光，並教導他如何堅持不懈地戒掉貪睡的壞毛病。動畫部份則由吳芷欣同學、鄭嘉慧同學及廖苑童同學製作。

除了創意藝術學系師生的參與外，動畫的角色配音更由救世軍田家炳學校的小學生聲演。在創意藝術學系動畫老師麥盛豐先生的指導下，三則動畫已經完成，並在救世軍田家炳學校的課堂內向小學生播放。救世軍田家炳學校網站更開設是次合作計劃專頁，上載三則品德達人歷史動畫，讓家長和學生可以隨時觀賞，從中學習中華美德。





為甚麼你的樣子看起來十分氣餒，

〈穿越時空見王獻之〉動畫



請你緊記，只有堅毅，才會成功。



〈穿越時空見愚公〉動畫



我的同伴是搞笑說，說說老師班懶懶

〈遇見司馬光〉動畫



計劃成果與意義

是次合作，體現了香港都會大學創意藝術學系師生與救世軍田家炳學校師生的創意交流及融會。一方面，創意藝術學系同學在課堂上學習的動畫繪製技術，得以應用在小學中華文化教育上。另一方面，田小同學用心創作的精彩故事，亦因此注入更多生命力。傳統歷史故事往往有其教育意義，品德達人故事把我們帶進古代世界，近距離地接觸歷史人物。創意藝術學系同學的動畫製作，活化歷史，提昇趣味，讓同學更深刻地了解中華文化的傳統美德，並在家庭、學校、社會上實踐履行，培養美好的個人品格。「品德教育動畫協作計劃」開展完滿而成功，預示著未來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在中、小學以創新方式推廣文化的可能性。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新書簡介：



《華文創意寫作與跨媒體實踐》出版

創意寫作跟過去的傳統寫作模式不同，不再只是作者的個人活動，而是一種群體參與和協調的交流方式。作者在新媒體時代獲得了空前的自由，他們通過各種網路途徑與讀者建立聯繫，以達到快速發布、迅速傳播、及時反饋的交流效果；而讀者面對海量資訊，逐漸傾向選擇具有優質內容的產品，對於創意也有更高的要求。同時，融合各種感官體驗的文字書寫因其獨特性和創意亦愈來愈受關注和青睞。

華文創意寫作學科在課題選擇、理論建構、研究方法和教學方法等方面，均有巨大的研究價值和實踐空間。本書收錄「第一屆華文創意寫作與跨媒體實踐國際研討會」中二十篇優秀論文，作者群包括王美棋、何嘉俊、吳美筠、吳麗嬋、李洛旻、邵棟、唐梓彬、孫慧欣、馬世豪、梁德華、梁慕靈、陳康濤、陳煒舜、陳曙光、黃納禧、劉文英、黎必信、戰玉冰、蕭欣浩與鄭文峯，以其學者、詩人、作家、藝術家或資深媒體從業者的身分，共同探討華文創意寫作學科在大學和中學的課程設計及實踐反饋，以不同媒介的創意文本為例，分析文學及新媒體時代文化產業的挑戰和機遇，以及當中國古典文化作為再創作資源時，其對當代華文創作的影響與啟示。期望透過經驗分享，能為華文創意寫作學科的推廣和發展做出貢獻，並顯示出媒體時代下華文創作的生命力。

訂購方式：

秀威書店：



博客來：



誠品線上：



媒體報導：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潘銘基教授演講，專題講座題目為「漢字與古代動物世界」，演講內容獲傳媒轉載，詳情如下：

「漢字與古代動物世界」專題講座

播放日期	播放時間	主題	媒體
19/6/2022	晚上 8:00 – 8:30	〈漢字與古代動物世界（上）〉	香港電台第一台《大學堂》
26/6/2022	晚上 8:00 – 8:30	〈漢字與古代動物世界（下）〉	香港電台第一台《大學堂》

香港都會大學

投稿須知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Newsletter of Tin Ka Ping
Centre of Chinese Culture

通訊

由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出版之《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通訊》為半年刊，每年3月及9月出刊，全年徵稿及收稿，各期專題截稿日分別為1月31日及7月31日。

本通訊歡迎任何與中華文化相關之文章，通訊內容分為「專題文章」及「一般評論」，每篇文章以1000至2000字為度。

投遞本通訊之文稿以中文或英文撰寫，屬於與中華文化相關之原創性評論文章，且不得同時投遞或發表於其他刊物。

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之著作權問題（例如圖片、表格、照片和長篇引文等），作者需自行取得著作權擁有者之同意。來稿如有涉及抄襲、剽竊、重製、侵害等問題，或發生侵害第三者權利之情況，概由投稿者負擔法律責任，與本刊無關。

本刊對於來稿之文字有刪改權，如不同意刪改者，請於來稿說明。如需修改，編輯將不作另行通知。

獲採用之文章，將致贈該期通訊5本，不另支付稿酬。

撰稿及注釋格式請參考臺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體例。

來稿請以Word檔編輯，投遞至：

「香港九龍何文田忠孝街81號香港都會大學

賽馬會校園E座11樓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通訊》收」，或以電子郵件

附加檔案方式寄至：tkpccc@hkmu.edu.hk；

如有查詢，請以電郵向

楊女士 vwsyeung@hkmu.edu.hk 聯絡。

Submission Guidelines

The Newsletter of Tin Ka Ping Centre of Chinese Culture is published by the Tin Ka Ping Centre of Chinese Culture (TKPCCC), 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HKMU). It is a biannual newsletter that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Chinese cultural exchange. The *Newsletter* is published in March and September, and we welcome submissions year-round. The deadlines for both issues are 31 January and 31 July respectively.

We welcome any feature articles and general commentaries about Chinese culture. Each article should be between 1000 and 2000 words.

The article should be written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and it should be original critical writing. Please note that we do not accept simultaneous submissions.

The *Newsletter*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copyright violations. The author is responsible for securing written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all copyright materials, including illustrations, photos and long citations. The author shall bear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ll legal consequences if violations occur, instead of the *Newsletter*.

The *Newsletter* reserves right to edit all manuscripts submitted without any prior notice. The author should inform us if this is not acceptable.

If your article is selected to be published in an issue, you will be given 5 copies of that particular issue as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No remuneration will be offered.

Please refer to the link below for the formatting and referencing guide.
https://www.chicagomanualofstyle.org/tools_citationguide.html

All manuscripts must be written in Microsoft Word format and submitted by mail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Newsletter of Tin Ka Ping Centre of Chinese Culture

11/F, Block E,
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Jockey Club Campus, 81 Chung Hau Street,
Ho Man Tin, Kowloon, Hong Kong.

Or as an email attachment to tkpccc@hkmu.edu.hk.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email Ms. Yeung at vwsyeung@hkmu.edu.hk.

出版：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地址：香港九龍何文田忠孝街81號

香港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E座11樓

電話：(852) 3120-2501

傳真：(852) 2406-2370

電郵：tkpccc@hkmu.edu.hk

網址：<https://www.hkmu.edu.hk/tkpccc>

©2022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2022年9月第2期 | 總10期

